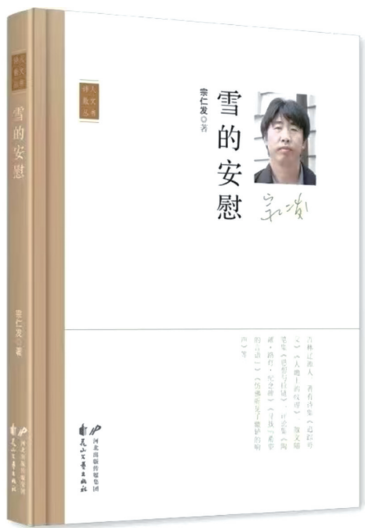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位编辑家的文学底色 ——宗仁发散文随笔集《雪的安慰》读记

齐凤艳



《雪的安慰》
宗仁发 著
山花文艺出版社

文集《雪的安慰》收录宗仁发散文和文学评论共计35篇，书名充满诗意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温婉地表达了宗仁发的文学情怀与抱负，以及他对文学之功用的期许。

翻看这部随笔集，不难发现，诗人们已将往日的激情与今天的理性熔铸于一体。面对一幕幕耳闻目睹的事件乃至亲身参与的经历，谁能不清楚身边一切来龙去脉呢？对冥思与苦想的记录与传达，便是诗人写下随笔时采取的立场。走出诗歌的疆界涉足随笔领域，是诗人们对这个时代敏感神经的另一种敲打。当这些文字变成印刷品，语词组合的不同方式所带给人们的刺激便会弥漫开来，各种接纳将引起精神结构深层的响应与启动。

宗仁发是中国当代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编辑家与评论家。在《雪的安慰》这部散文随笔集里，他的学识广博与深厚尽显无遗。他的散文常常旁征博引，信息量与知识量巨大，从中可见他深厚的文学、历史、哲学功底，以及宏阔的识见、敏锐的判断力和独特的审美眼光。

这些素养，使他能够密切追踪当代创作潮流与理论动态，建立清晰的文学史坐标系和当代文学地图，迅速判断作品的独特性、艺术完成度与潜在价值。同时，他的文学理论修养使得他能进行有深度的文本分析，与作者展开专业对话。比如写于十九年前的《一种历史叙事的尝试》一文——一篇关于赵柏田文集《历史碎影》的评论——宗仁发不仅恰当引用了茨威格、克罗齐、科林武德、费正清等人的论断，其分析还表现出他对文学作品中外部宏观世界与自我微观世界、过去与现在、权力历史意识与个人历史意识之间的辩证认识，间接反映出他的文学理念及评价维度。

在文集第二篇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重要吗——读柯平的〈吴山档案〉》一文中，他明确指出，文学性是欣赏《吴山档案》的根本，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的确不重要。他写道：“说得再彻底些，《吴山档案》的姓‘文’不姓‘史’，恰恰完全依赖于茨威格所说的历史本身——‘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，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。’也就是说，在歌德曾怀着敬意称为‘上帝的神秘作坊’的历史里，本身就隐含着故事性和趣味性。但这种隐含着的故事性和趣味性绝非自动呈现，而是需要作家用‘建构的想象力’去发现和寻找。”他再次赞颂了文学的意义和书写的力量。而在这篇卓有见地的文章结尾，他却说：“这是我读《吴山档案》时的一段走神，一通胡思乱想，柯平先生见笑了。”这份自谦，非常符合他文字中普遍存在的平实风

格。他的散文和文学随笔将“形散”发挥到了相当高度，将“雅”与“随意”妙合无痕。

文集《雪的安慰》中，宗仁发的许多观点都给人以新的认识。比如《鄂华：巨人式的写作》中，“对一个才华横溢作家的忽略，往往就是在文学史以思潮为脉络的梳理中造成的”；“实际上鄂华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标新立异的，他的视野和志趣都决定了他不能接受平庸的写作”——这些话都引人深思。再如《长白山是他的文学领地》一文中，宗仁发对胡东林自然文学写作与其他作家生态文学写作所做的比较、对自然文学审美独特性的提问、对“写得亲切”的强调等等，无不启迪读者如何带着思考阅读，如何以审美的目光凝望文学作品和现实世界。

关于自己的人生选择，宗仁发曾这样说道：“1988年从《关东文学》调到《作家》一直到现在，三十二年就始终在这里。1990年代时，也确有出版商朋友想让我和他们一起做书赚钱，我想这个不适合我。1997年省文联作协换届时要提拔我到文联当专职副主席，如果去上任，就得离开自己正在准备改版的《作家》，犹豫再三还是和省里说明自己的想法，就继续留在作协办杂志了。有人赞赏一个人一辈子要做好一件事，一件事也完全可以做一辈子。我实际上也比较认同这种说法。某种意义上讲，人生的选择也意味着对自我的发现和顺应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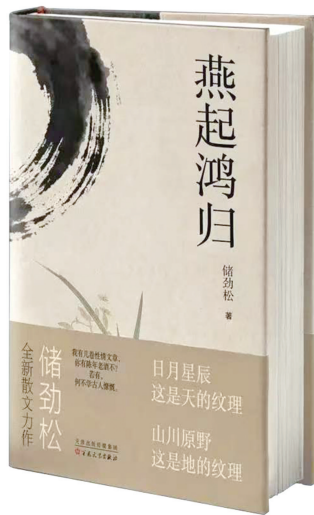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选择的本质，往往不在于外部得失，而在于内在自我的逐渐显现与接纳。在选择的压力下，我们会发现自己真正向往什么。自我的发现与顺应，既包含坚持向前的方向，又包含灵活调整的姿态，是在行动与反思的循环中，让外在生活逐渐与内在真实同频共振。当我们把宗仁发1997年拒绝提拔为文联副主席和1985年主动要求承包财政要“断奶”的《关东文学》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很多东西便显露出来，也让人有所发现。

《回到〈关东文学〉——1980年代第三代诗歌的一个现场》一文中，宗仁发没有提及他遇到的种种困难。但自从他把《关东文学》“当作一个可以做事的机会接到手里”，很多人便知道了辽源在东北哪个省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我看到了许多非常有名的作家的名字和作品题目，他对此如数家珍。“凭着一股莽撞热情”，他为《关东文学》和作家们开辟了一片天地：刊物办了两个版本，通俗版每期发行七十多万册，纯文学版推出了格非、李洱、鬼子、韩东、李亚伟等一大批先锋作家和第三代诗人的重要作品，这些人如今都已成为文坛中坚。他主持对《关东文学》进行大胆改版，突破地域限制，积极吸纳先锋文学和实验性作品，使其迅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探索的重要阵地，影响力远超地方性刊物的范畴。这段经历，也为他日后调任长春、成功主编《作家》杂志并使其成为中国核心文学期刊之一，奠定了重要基础。他编发的短篇小说曾获第一、二、四届鲁迅文学奖，编发的长篇小说曾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。

宗仁发也收获了来自作家们的温暖与敬意。宋琳在1987年底这样赞誉《关东文学》：“我也常读《关东文学》，的确很喜欢，这是《中国》之后真正的现代主义阵地。”何小竹在1987年9月6日的信中说：“诗歌正处于一个诗歌史上从未有过的关键时刻，贵刊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起到非凡的作用，将为人所永远记得。”2020年11月15日，刘庆在《青年报》上刊发题为《今生幸识宗仁发》的文章，结尾写道：“诗人宗仁发，评论家宗仁发，文学编辑家宗仁发，仁厚朋友宗仁发，持久地坚守了他的内心，并将持久地坚守下去。今生幸识宗仁发，文学幸有宗仁发。”我与刘庆深有同感。

读书人一生的修行 ——读储劲松散文集

汪光平



《燕起鸿归》
储劲松 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储劲松的新著《燕起鸿归》，书名源自书中同名散文。他在文中这样释义：字好，意思也好，飞燕剪春雨，归鸿裁祥云。一语清新通透，画面感十足。燕子穿梭春雨，鸿雁舒展云天，轻盈、明净、安然。也正因这份恬淡清雅，可作厅堂横批，可题春日小景，自带一种干净朴素的草木气息，温柔治愈，悠然舒展。我在反复品读、细细回味之后，总觉得这四个字的意蕴，远不止春日风物的清丽。

在中国古典诗文的长河里，燕去鸿来，本就是时光流转的象征。燕子翩然起飞，是时节更新；鸿雁振翅南归，是岁月轮回。它既代表四季更迭、山河有序，也隐喻人间聚散、游子归途，更暗含人生进退、世事浮沉。燕起，是轻盈灵动、顺势而行；鸿归，是沉稳笃定、初心自守。一柔一刚、一放一收，恰好对应古代士人出入江湖、俯仰天地的人生状态。

相比《燕起鸿归》清新冲淡的草木之气，储劲松的另外两部文集——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：贬谪中的宋代文人》与《文章憎命达：大唐文人的遇与不遇》，其实更贴合“燕起鸿归”的深层气象，也更配得上黄道周的人格高度，更当得起徐霞客对他的至高评价。

徐霞客一生遍历山河，阅尽世间名流，极少由衷赞许他人，唯独对黄道周推崇至极，誉其文章为国朝第一、字画为馆阁第一、人品为海宇第一，称其为“一代完人”。在我看来，黄道周的一生，就是最真实、最厚重的“燕起鸿归”。

黄道周的书法取法鲍照《飞白书势铭》，笔势错落灵动，如燕起参差、敬侧多姿；整体格局开张雄阔，似鸿归长空、气脉连绵。笔有棱角，字有风骨，绝不流俗媚世。他的文章刚正笃实、直抒胸臆，句句关乎世道人心；为人磊落孤高、守义持节。一生屡遭贬谪、屡经风波，却始终朝堂敢谏、江湖治学，临危不屈、殉国成仁。进退之间，不改其志；浮沉一世，不失其骨。

这种命运坎坷而志气愈坚、境遇困顿而操守愈净的人生，正是唐宋文人最动人的精神底色，也正是储劲松两部文集中着力书写的士人风骨。

大唐文人，多以孤笔抗逆境，文章多从磨难中来；宋代士人，常在庙堂与江湖之间辗转，进退皆存家国情怀。所谓“文章憎命达”，不是天意薄情，而是磨难淬炼胸襟；所谓“庙堂江湖之间”，正是一代代读书人一生的抉择与坚守。他们身处低谷却不坠青云，历经风雨依然心怀温热，文脉与风骨，代代相承。

相较于轻盈温润的春日意象，我更偏爱这份历尽沧桑依然挺拔的厚重。真正的“燕起鸿归”，不只是风景的清雅，更是人格的从容；不只是笔墨的灵动，更是风骨的坚定。

燕起，是士人入世的热忱，心怀天下，积极担当；鸿归，是君子出世的清醒，守住本心，笃定自持。四个字，写尽文人一生的起落与坚守。

燕起鸿归，从来不止风景。它是读书人一生的修行：于起落中守本心，于浮沉中存气节，于乱世中担道义。清风不负，风骨长存，便是这四字最深远的意蕴。

